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6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本刊长期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注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本期“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专题特邀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吴定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周丹等专家学者撰文，以飨读者。

## 基于经济发展视角的东西方文明兴衰分析

吴定海 袁义才 高雪莲

**摘要：**东西方文明兴衰分析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有关的研究对于认识和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意义重大。应用GDP等经济发展基础性指标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测度，引出东西文明的分类及更替研究。中华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18世纪以前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中国经济衰落，西方文明崛起，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推动西方经济迅速发展，支撑西方文明近200年的繁荣。美国在二战前后成长为西方文明代表，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领先全球并形成霸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等西方经济相对衰落，东方文明复兴态势明显。东方文明兴起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及能否促进文明交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关键词：**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经济；中国；美国

**中图分类号：**G04;K103;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3)03-0028-10

### 一、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测度与分类

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文明兴起和衰退现象一直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它的探究对于认识和把握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意义重大。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东西方文明兴衰，以相关经济数据为基础作出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这种运用经济学范式对文明的研究，需要从研究人类文明进步的测度标准起步，并且与人类文明的分类研究密切关联，进而结合东西方文明发展

的经济研究，分析研判人类文明发展趋势。

#### (一) 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测度标准

人类文明是内涵宽泛的概念，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认识。面对本身就包含认识不统一问题的人类文明，研究并提出具体的测度指标，成为学术界争议较多、一直试图取得突破的课题。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莫里斯(Morris, 2010)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首次用“社会发展指数(HDI)”对文明发展做了测度，2013

年他又推出《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民族）命运》一书，对社会发展指数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和量化分析，一度引发了对文明测度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不过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四大要素需要将研究上溯到古代，相关数据收集和估算也就非常不确切，因此，不少学者对莫里斯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批评莫里斯的同时，学者们对文明测度指标进行更多新的研究。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Massimo Livi-Bacci, 2005）曾经在其代表作《世界人口简史》中提出，人口“是繁荣发展的天然尺度”<sup>[1]</sup>，无需任何调整即可直接进行历史比较，曾经被广为关注。大历史（Big History）学派创始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 2007）也认为，人口代表着人类生存能力，可以用于测度文明的转型升级<sup>[2]</sup>。宋丙涛和潘美薇（2019）则认为，人类文明应是家国天下的共享性的文明模式，提出应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人类文明<sup>[3]</sup>。

前述学者们所提的文明测度指标，各有优势与不足，没能对文明进行科学或精准的测度。其中，人口指标过于单一，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发达国家低生育意愿等不同因素影响下的现代社会，已经不能够完全反映经济繁荣和文明发展程度。而公共经济虽能从国家治理视角反映文明程度，但并未直接反映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趋势。综合各方面研究，我们认为，鉴于从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复杂而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不仅文明测度指标必须是复杂且变化的，而且文明本身都应该是个发展的范畴，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而试图找一个不变的或是十分精准的指标来对文明进行测度是不现实的。因此，本文不作人类文明界定，基于将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共

识，尝试找一个能相对准确地反映文明趋势的测度指标，找到一些内涵狭小的指标做出准确的文明测度是很困难的，而寻求内涵较大、关联性较强的指标来相对准确地进行文明测度是可行的方向。

经济发展不仅本身是文明进步的一个基本方面，而且与技术、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密切相关，在可选的文明测度指标中有着综合性、基础性地位，因此我们这里暂且选择运用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对人类文明发展进行测度和比较。实际上从较大历史尺度、以较大国家或经济体为对象来看，东西方文明兴衰、更替与经济崛起、衰落的轨迹几乎是一致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正相关关系。鉴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多项经济指标准确获取有困难，我们在相关学者研究基础上，主要应用最基础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即GDP指标来衡量东西方大国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并于近代以前辅以人均GDP指标，现代则辅以科技、金融等多个有一定数据支撑的相关指标，力争以这些经济发展指标对人类文明做出相对准确的测度和比较。

## （二）关于世界文明的分类

东西方文明分类是个需要厘清的范式。对于世界文明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少颇有争议的研究。传统上西方世界史研究把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古典文明（公元500年之前）、中世纪文明（约在公元500-1500年）和近（现）代文明（1500年至今），其中中世纪文明是以欧洲独有的历史进程为依据，近现代文明则以是否进入工业革命来判断。不过，这种划分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偏见，默认西欧是世界文明的代表。这一标准显然不应整齐划一地用于其他进程的国家，比如中国1840年以后才进入近代，比欧洲史的近代要晚300多年<sup>①</sup>。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崛起，

<sup>①</sup>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被公认“全球史观”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中，摒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世界各国历史进程无须整齐划一，提出以公元1500年划分世界历史。这就避免了我国按照西方划分的近代化进程的尴尬。另一位“全球史观”的代表人物，W.H.麦克尼尔依文明的封闭与联系度，把文明进程划分为“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也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为方便起见，本文沿用传统习惯，仍保留中世纪文明的说法。但在研究中，采用“全球史观”的视角，以历史进程转折点划分。（McNeill, William H., (1963), *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随后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地位突出，也成为西欧世界文明代表观的挑战。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sup>[4]</sup>（2000）中比较 18 世纪的欧洲和中国江南地区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西欧在人口、农业生产率、生产资料等方面，并无明显的内生优势，并非天然的世界经济中心，只是在 19 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才占据了支配地位，因此以西欧发展为标准进行文明史划分明显是有失偏颇的。

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划分争议引出东西方文明的分类问题，现在普遍存在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以欧洲、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划分做法。为便于更清晰地考察东西方文明兴衰所伴随的经济发展进程，我们选取的东西方文明的代表中，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华文明，主要应用中国经济数据，印度为辅助，西方文明主要是指西欧、美国等国家的文明，日本有时作为辅助。

## 二、18 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居世界前列，东方文明领先全球

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经济曾经在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大约公元 2000 年时间在全球经济中占比较大，处于领先地位，支撑着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形成与繁荣。自秦王朝（公元前 221 年—前 207 年）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文字起，中国经济在公元 1500 年甚至是 18 世纪以前长期居世界前列。正如美国历史学家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保持着同一民族和同一文化的聚合性、连续性以及独特的现实主义，不像欧亚其他文明，存在教会（或祭司阶级）与国家间的分裂。除民族思想文化统一外，农业种植、冶炼、瓷器等技术创新及其在本土的迅速广泛传播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表 1 显示，8—17 世纪（即唐、宋、南宋、金、元、明、清），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处于上升阶段。到 1820 年统计期（清朝道光年间），中国 GDP 占世界比重达 32.9%，将近 1/3。

表 1 公元 1000 年以来中印美西欧日占世界 GDP 比重 (%)<sup>[5]</sup>

年份	中国	印度	美国	西欧	日本
1000	22.7	27.8	0.4	11.2	2.6
1500	24.9	24.4	0.3	20.5	3.1
1600	29.0	22.4	0.2	22.6	2.9
1700	22.3	24.4	0.1	24.9	4.1
1820	32.9	16.0	1.8	26.6	3.0
1952	5.2	4.0	27.5	29.3	3.4
1978	4.9	3.3	21.6	27.8	7.6
2003	15.1	5.5	20.6	21.1	6.6
2008	17.5	6.7	18.6	19.1	5.7
2019	16.3	3.3	24.4	16.7	5.8
1998	11.5	5	21.9	20.6	7.7
2019	16.3	3.3	24.4	16.7	5.8

注：表格中公元元年—1998 年数据均源自麦迪森的著作《世界千年经济史》，麦迪森所收集的西欧数据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瑞士 12 国。2019 年数据出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由笔者进行整理所得。数据引用说明：为便于比较，本文所选 1998 年之前的数据均出自英国经济史数据考证和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世界千年经济史》。曾轰动一时的托马斯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所用数据也是引用此书。虽然这些数据颇具争议，但本文继续选用，读者如果有进一步考证的需要，可参考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及其团队结合中国史实对麦迪森的诸多数据所作的重新估算<sup>[6]</sup>。

## 三、近代中国经济地位、文明衰落与西方经济、文明的兴起

到了近代，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与之相伴的东方文明逐渐衰落，西方经济快速成长，与西方文明逐渐兴起。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推动西方经济自 18 世纪起迅速发展起来，支撑西方文明近 200 年的繁荣。

### （一）东西方经济增长率差距明显

1820 年，尽管中国 GDP 总量世界第一，但

GDP 增长率却已经大幅度落后于西欧和日本，1820-1870 年 GDP 增长为 -0.37%，同期西欧为 1.65%，美国高达 4.2%，世界平均增长率 0.93%。19 世纪 60-90 年代，中国晚清洋务运动虽然大量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自 19 世纪初，多年以来 GDP 增长率达到最高峰，但也仅仅是 0.56%，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美国、西欧、日本。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差距才得以扭转（见表 2、图 1）。

表 2 公元元年到 20 世纪以来世界与中美西欧日的 GDP 年均增长率 (%)

年份	世界平均	西欧	美国	日本	中国
0-1000	0.01	-0.01		0.1	0
1000-1500	0.15	0.3		0.18	0.17
1500-1820	0.32	0.41	0.86	0.31	0.41
1820-1870	0.93	1.65	4.2	0.41	-0.37
1870-1913	2.11	2.1	3.94	2.44	0.56
1913-1950	1.85	1.19	2.84	2.21	-0.02
1950-1973	4.91	4.81	3.93	9.29	5.02
1973-1998	3.01	2.11	2.99	2.97	6.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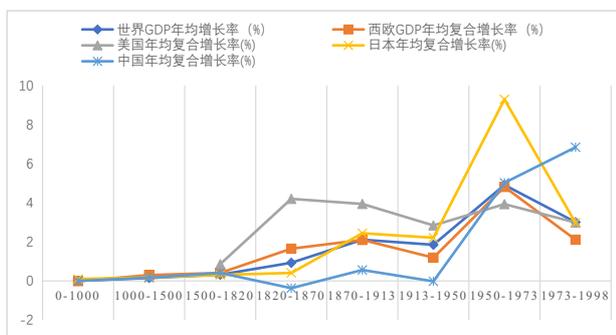


图 1 公元元年到 20 世纪以来世界与中美西欧日的 GDP 年均增长率

(二) 东西方人均 GDP 差距不断加大

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人均 GDP。1500-1700 年之间，作为东方最大经济体的近代中国正处明朝时期，根据表 3、图 2 显示，

这一时期中国人均 GDP 由 852 美元增长至 1089 美元，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位列第一，但 1700 年清代之后人均 GDP 迅速转为负增长，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820-1950 年间，人均 GDP 持续下降，低于 1500 年人均 852 美元的水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甚至不及 1500 年之前的水平。同期相比，印度的人均 GDP 由 1500 年的 682 美元首次下降到 1700 年的 622 美元，1820 年再次下降到 564 美元。反观西方各经济体的人均 GDP 数据，1500-1952 年期间，日本、美国的人均 GDP 节节攀升，1700 年之后，美国的人均 GDP，增速较快；欧洲人均 GDP 自 1600 年起，年均增长率正增长趋势显著，在 1700 年以前基本平稳发展；1700 年起欧洲、美国、日本等西方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西方文明因此逐渐崛起。

表 3 近现代东西方经济体人均 GDP 水平比较

单位：国际元

年份	东方代表经济体		西方代表经济体			全世界
	中国	印度	日本	欧洲	美国	
1500	852	682	554	896	400	714
1600	859	682	596	881	400	714
1700	1089	622	610	893	527	759
1820	623	564	759	1215	1257	704
1952	538	629	2336	4342	10316	2260

数据来源：HNA 项目修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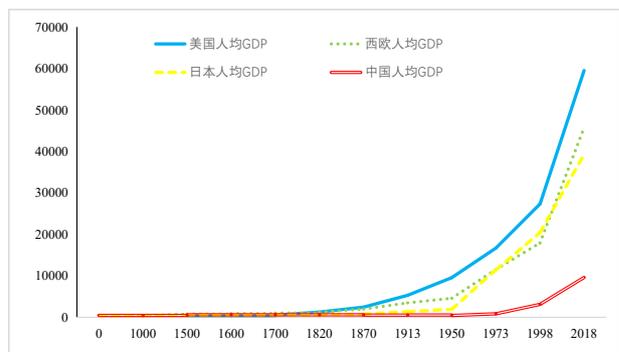


图 2 公元元年-2018 年中国与美国、西欧、日本人均 GDP 对比

中国人均 GDP 较低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总量较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增长较快。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公元 1700 年以前，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人口的 2 倍，东西方文明在人口上始终有着巨大的差距<sup>[7]</sup>。但是中国人口由 1700 年的 1.38 亿人，飞快增长到 1820 年的 3.81 亿人，此后历经战乱，1870 年减少到 3.58 亿人，到 1950 年又重新增长到 5.48 亿人，增加近 4 倍。同时也与中国未能及时跟上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发展步伐有关。1820-1950 年，西欧人口由 1.14 亿人，增长到 2.57 亿人，增长约 2.2 倍，人均 GDP 增长了 2.73 倍。美国人口增加 1.45 亿人，人均 GDP 增长了 6.61 倍。

### （三）东西方经济占比的此消彼长态势明显

从世界结构上看，东西方经济占比的此消彼长态势更为明显。近代西方经济发展势头迅猛，而东方经济则由强变弱。根据表 4、图 3 所示，借用麦迪逊及 HNA 项目修正数据，对比 18 世纪以前东西方经济体的 GDP 总量占比情况可见，1500-1952 年，东方代表经济体的 GDP 世界占比从 1500 年的 55.62% 上涨至 1600 年的 57.79%，之后持续下降至 1952 年的 9.13%，降幅很大；而西方代表经济体 GDP 占比由 1500 年的 23.15% 持续增长至 1952 年的 60.17%，涨势凶猛。1500-1820 年，虽然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经济体总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方经济，但在这一阶段的欧洲、美国、日本等西方经济体 GDP 所占比重稳步上升。1820 年之后，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新大陆”的不断开发，东西方经济差距拉大，东西方代表经济体 GDP 总量分流极明显，总体经济有流向西方经济体的趋势。1820-1952 年，在八国联军侵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影响之下，作为东方代表经济体的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走向衰落，GDP 占比极速下降，而作为西方代表经济体的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蒸蒸日上，GDP 则突飞猛进。总体来看，工业革命后，近代 1500 年到 1952 年，西方经济迅速增长，东方经济所占比重断崖式下跌。从时间来段来看，19 世纪中后期西方经济总量以绝对优势超越东方经济总量。

表 4 近代东西方经济体经济（GDP）发展水平比较

单位：GDP/十亿国际元

年份	东方代表经济体			西方代表经济体				全世界
	中国	印度	总体占比 (%)	日本	欧洲	美国	总体占比 (%)	
1500	99.7	75.0	55.62	8.5	63.4	0.8	23.15	314.1
1600	137.4	92.1	57.79	11.0	79.9	0.6	23.04	397.1
1700	150.2	102.6	55.22	16.5	98.6	0.5	25.25	457.8
1820	237.2	117.9	48.42	23.5	205.9	12.5	32.98	733.4
1952	305.9	234.1	9.13	202.0	1730.7	1625.2	60.17	5912.8

数据来源：HNA 项目<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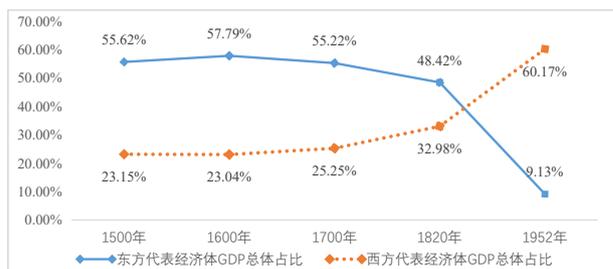


图 3 近现代东西方代表经济体 GDP 占比情况比较  
注：东方代表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西方代表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麦迪逊 2016 数据及 HNA 项目修正数据计算所得。

从各经济体发展情况来看（如图 4 所示），1500-182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总体的 33% 左右，经济总量居世界榜首；1500-1700 年，印度经济总量占比约为 23%，居世界第二。1952 年西方 GDP 总量是东方经济的 6.5 倍，除日本外，西方各经济体的 GDP 世界占比大幅度高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经济体的 GDP 占比。其中，欧洲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经济总量居世界首位；美国经济快速崛起，GDP 占比由 1820 年的 1.7% 涨至 1952 年的 27.49%，位居世界第二。自此，东西方经济背离发展，不断深化的工业革命使得欧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同时美洲新大陆的开发破除土地资源不足的瓶颈为经济增长提供较大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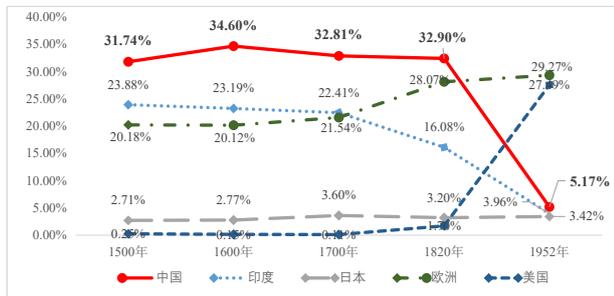


图4 近现代东西方国家或区域 GDP 世界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由笔者根据麦迪逊 2016 数据及 HNA 项目修正数据计算所得。

#### 四、美国经济霸权的形成与衰落

##### (一) 二战前后美国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后西欧实力大大削弱，美国凭借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日益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表。

1. 经济贸易霸权。在经济方面，二战前西欧9国的出口值是美国的1.5倍，而战后仅及美国的1/2<sup>[9]</sup>。1946年整个西欧的工业产量较1937年下降了30%，美国的工业产量却上涨了47%；同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的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由30.5%下降到2.2%，而美国却由41.4%上升到56.4%。1946—1952年，美国先后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380亿美元的援助<sup>[10]</sup>，出于政治与经济发展需要其中超过132亿美元拨向欧洲，相当于美国总援助金额的34%。1955—1965年10年间，美国向西欧的直接投资额由30亿美元猛增到139.8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16.6%，使得在西欧的美国公司迅速发展并在行业中极具垄断优势。美国一方面通过实施“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促进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的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使美国得以控制西欧的工业、财政和贸易发展，使其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因此马歇尔计划进一步加快了美国向西欧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扩张，促使美国在西方文明体系地位不断提高。

如图5所示，1960—2018年美国经济总量绝对值呈现加速上升之势，1990年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冷战结束，美国成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由此步入了全球经济霸权阶段，经济总量一直居于世界榜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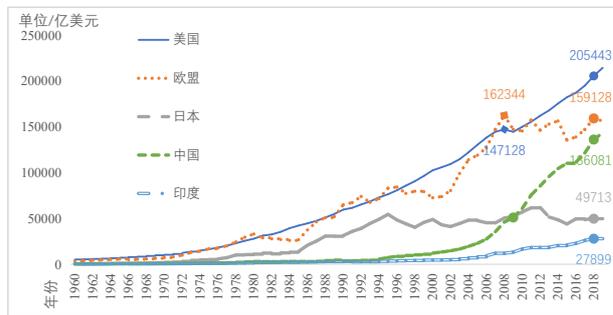


图5 1960—2018年世界各经济体 GDP 数据

2. 美元取得世界货币地位。在金融方面，美元已是世界货币。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实际上成为西欧各国唯一的国际支付和流通的手段，美元同黄金、同资本主义各国的货币直接挂钩并保持固定的汇率<sup>[11]</sup>，这一举措使美元称霸世界金融体系。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霸权地位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多数国家货币仍与美元挂钩；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仍是绝大多数外汇批发业务的交易手段，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所占比重在1987年降至48%后多年保持稳定。1999年欧元问世，虽然不少国家曾纷纷表示要通过减少美元改储欧元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但是2000年在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仍占73.3%，欧元占10.2%；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4.3%，欧元占14.6%<sup>[12]</sup>。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地位有所冲击但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例仍然有60%。目前来看，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是国际主要货币，也是国际贸易、投资和结算的主要工具。美国不断利用美联储加息、随意超发货币等金融手段，引发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使得美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薅羊毛”。

3. 科技霸权。二战期间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实践，标志着美国政府全面领导并展开科学技术战略。二战后，美国牢牢占据世界科技的中心地位，其科技和知识创新优势明显。20世纪90年代美国步入信息社会，作为世界信息产业的发源地，美国一度拥有软件公司8万多个，软件业的年增长率为18%，世界排在前10位的软件公司有8个总部设在美国<sup>[13]</sup>，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国。综上，直到2018年，系列风波之

后尽管世界局势变动纷杂,美国仍在“一超独霸”。美国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地位未发生质的改变,其相对综合国力依然强大。

## (二) 当代美国的相对衰落

1. 经济相对衰落大势所趋。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二战后,美国四处挑起战争充当“世界警察”,在庞大的海外驻军的开支以及频繁的战费之下,美国经济不堪重负,军事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相较于欧盟、日本等经济体而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减慢,GDP增长率长期在3%~4%左右徘徊(如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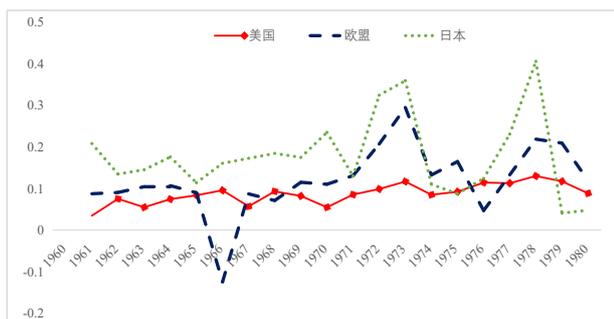


图6 1960-1980年欧盟、美国、日本GDP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图5数据计算所得。

从世界经济发展看,美欧日益衰落已是大势所趋。根据图5数据计算,2018年欧盟、日本的GDP较2008年分别降低1.98%、1.32%,经济衰退明显。2018年美国GDP较2008年增长3.96%,然而整体看来,虽然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波动较大且下降幅度明显(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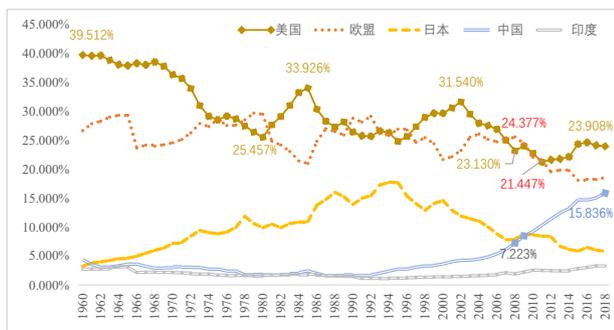


图7 1960-2018年东西方经济体历年GDP世界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快易数据库—世界各国历年GDP占世界比重<sup>①</sup>。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加上新经济泡沫破裂,美国经济由减速转变为负增长。在美国经济持续减速的同时,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欧盟经济也趋向停滞,世界经济出现衰退。2008年金融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在经济、金融、军事、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原有优势和影响力,未来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维系霸权的创新优势也大打折扣。

2. 金融风险集聚。在金融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欧美金融业严重受创。美元霸权也在不断受到挑战而被弱化,部分产油国已决定采取欧元或“一篮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结算手段,美元地位有所减弱。自2012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超过100%,2022年美国债务总额3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2年GDP 26.13万亿美元的1.2倍。近年来,美国国债到期收益率倒挂引发市场担忧,美国金融发展岌岌可危。

3. 科技创新发展相对下滑。基于前文分析,尽管从全球经济、金融竞争力、研发投入等数据看美国占优势,但总体看,已难再现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不久,“9.11”事件突发,迫使美国将战略焦点转向安全领域。一度被视作后新经济时代增长点的纳米、信息通讯、军事科技、新能源技术等终究无法同当年军事、信息、生物技术领先别国的绝对优势相提并论。

从研发占GDP比重角度来看(如图8所示),目前韩国研发占GDP比重最高,由1998年的2.16%上涨至2018年的4.32%;日本位列第二,研发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2.87%上涨至2018年的3.75%;美国位列第三,研发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2.50%上涨至2018年的最高的2.84%,较韩国、日本的比重相对较低。与此同时,中国自1998年以来研发投入量由197.97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4748.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4.92%(根据图8计算所得)。

<sup>①</sup> 快易数据库——经济与增长, <https://www.kyle.com/sta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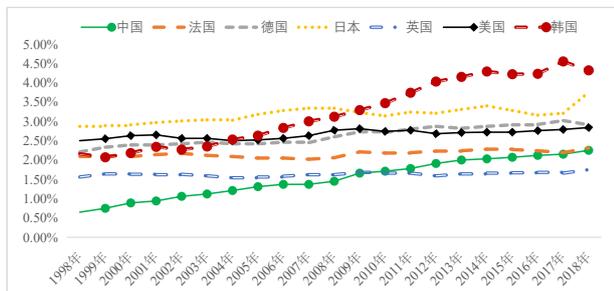


图8 世界各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情况

从PCT专利申请量世界占比情况来看(如图9所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PCT专利申请量占比持续下降。2015-2019年美国PCT专利申请量占比由26.28%持续降至21.76%,中国由13.69%上升至22.19%。另外,美国公司PCT专利申请不再居于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4411件PCT国际专利申请排名第一,位居其后的是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661件)、韩国三星电子(2334件)、美国高通公司(2127件)和中国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927件),排名前10的企业申请人中包括4家中国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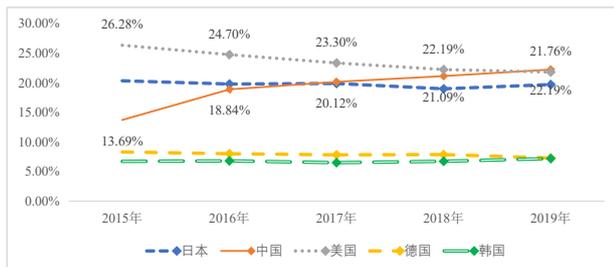


图9 世界各国PCT专利申请世界占比比较

## 五、中国的经济复兴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发展飞速,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多项指标连年跃居世界首位,城市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 (一) 综合国力快速增强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GDP总量达121万亿元,人均GDP 12741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2013年至2021年,中

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中国GDP世界占比由2008年的7.2%涨至2021年的18.5%,而美国GDP总量虽持续增长,但其GDP世界占比却基本未变,由2008年的23.1%微涨至2021年的23.9%<sup>①</sup>。由此可见,美国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一度倒退,而凭借全球化浪潮而发展起来的“金砖国家”构成了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进一步压缩了美国的经济霸权空间。

### (二) 技术进步已经居世界前列

中国已经由传统农业大国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2010年以来制造业稳居世界第一,正向制造强国迈进。2021年,中国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12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中国全国全社会研发投入由1978年的52.89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起,中国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21年底,中国国内(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7.5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讯网络、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三) 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

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值达39.1万亿元,以美元计价达到了6.05万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提升到13.5%。2021年,中国已经连续5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外汇储备连续17年保持世界第一位,服务进出口贸易、非金融类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居世界第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先后设立了21个自由贸易区试验区,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成就。

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起来,产业、科技竞争力及世界经济影响力都明显增强,引发东方文明崛起的联想。据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统计公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织相关数据测算，中国经济总量从1980年占世界经济1.7%的比例，上升到2022年的18%，而同期代表西方世界的G7国家的GDP总量占比则从1980年世界经济的61.7%下降到2022年的43.9%，其中除美国的世界经济占比在25%左右波动之外，G7其他国家几乎下降了一半。而以新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世界经济占比观察，与西方国家的此消彼长态势更为明显。这意味着美国及整个西方国家经济地位的动摇，并直接影响到西方文明地位，特别是中国快速发展推动东方文明复兴，使得21世纪的世界文明形态发生新的变化，其中特别是东西方文明关系需要加以审视。

## 六、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性探讨

### （一）新世纪东西方文明是否处于交替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复兴，这种较为明显的此消彼长态势是否意味着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交替之中？虽然一时难以定论，但是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整体上看，由古至今人类文明发展存在东西方文明交替领先的现象。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之一，在农业社会中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sup>[14]</sup>。西方文明则凭借工业革命支撑在短短200年时间完成了文明的飞跃，迅速取得领先全球地位。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有望引发新的人类文明交替。日本著名文化学者岸根卓郎（1990）的《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sup>[15]</sup>，史学家村山节和著名经济评论家浅井隆（2000）的《东西方文明沉思录》都提出文明以800年为一个周期，21世纪或22世纪，东方文明的时代将会来临<sup>[16]</sup>。莫里斯（2010）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预测，到21世纪中叶经济中心可能由西方转到东方<sup>[17]</sup>。

### （二）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细究起来，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发生文明兴衰有其规律性、必然性，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其适应历史发展、领先全球的阶段，背后推动力量主要是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因素，而根本性决定力量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因素寻找，最后的定论则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根本上看，农耕文

明在农业社会占主导，但随着人类社会摆脱物质短缺进程中的工业化大生产兴起，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农业社会时期，东方文明相对领先，得益于农耕技术创新的传播和追求和谐统一的思想文化。工业革命时期，西方文明在工业文明中居于领头羊地位，是由于三次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时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大数据时代，东方文明迎来了重新崛起的新契机，有望实现从跟跑向领跑转变，这中间应该蕴含东方文明更适应信息时代创新所需要的和谐共进的文化特征，而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则亟待研究。

### （三）新世纪文明形态是冲突还是交融

新世纪文明形态，因为与之前文明兴衰所处时代不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不同，带来人类文明冲突还是融合的新课题。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但是新世纪文明形态之中却蕴含着文明冲突问题，迫切要求文明交融。美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夏季号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论文，提出冷战后主宰全球冲突的将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源于文明的冲突。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在《哲学研究》1994年第3期发表《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在2004年北京论坛主旨报告中都对亨廷顿的观点做了批评，提出其真实意图是复兴西方文明，是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战略服务的。中国要有“文化自觉”，不断审思自身的优缺点，并为“文明的共存”做出贡献<sup>[18]</sup>。1997年，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主张建立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多元文化秩序<sup>[19]</sup>。在2019年5月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旨演讲提出“文明和谐论”，再次从政府层面表达了中国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认识，回击了“文明冲突论”。

东方文明复兴有可能解决文明冲突问题，通过更能促进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力争在交流共鉴基础上实现全球文明和谐共存、相互融合，形成

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人类文明经历的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落后到进步的演进过程，根本上看是文明形态的更替、创新过程。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东方文明新形态，有望成为促进文明交融、共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 参考文献：

[1] [意] 马西姆·利维巴茨. 繁衍：世界人口简史 [M]. 郭峰，庄瑾，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美] 大卫·克里斯蒂安. 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3] 宋丙涛，潘美薇. 文明测度、治理绩效与公共经济的共享特征——兼论西方量化史学的逻辑缺陷 [J]. 经济研究，2019，（11）：21-36.

[4] [美]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M]. 史建云，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 [英] 安格斯·麦迪森 (Angus Maddison) 著. 世界千年经济史 [M]. 伍晓鹰，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附录 A 和 B.

[6][8] 金星晔，管汉晖，李稻葵，BROADBERRY Stephen.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 1000—2017 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 [J]. 经济研究，2019，（7）：14-29.

[7] 谢丰斋. 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谈安格斯·麦迪森的“千年统计” [J]. 史学理论研究，2012，（4）：40-48+158-159.

[9] 张幼香. 二战后欧美经济关系的演变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96-100+106.

[10] 陈双平. 战争，美国获利的契机 [J]. 国际展望，1999，（7）：20-22.

[11] 李佳桐，张小洪，陶然，石宜家. 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背景与演变分析 [J]. 中国商论，2018，（5）：78-80.

[12] 袁冬梅，刘海云. 美元特权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探析 [J]. 国际贸易问题，2007，（1）：102-107.

[13] 金满涛. 美国服务贸易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J]. 银行家，2018，（11）：106-107.

[14] [美]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 (L.S. Stavrianos). 全球通史 [M].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66.

[15] [日] 岸根卓郎. 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 [M]. 王冠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6] [日] 村山节，浅井隆. 东西方文明沉思录 [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17] 伊恩·莫里斯. 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M]. 李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8] 汤一介.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C]// 北京论坛（2004-2015）主旨报告与特邀报告集.

[19]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5-22.

作者：吴定海，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  
袁义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化城市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通讯作者：高雪莲，天津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修琦